
刘少奇与华中敌后抗战

徐承伦

刘少奇于 1939 年 1 月到华中, 组建中原局, 并担任中原局书记, 1942 年 12 月回到延安。在此期间, 他把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指示与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 纠正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 迅速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局面。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后, 以刘少奇为首的华中局, 把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贯彻到新四军部队和长江南北的广大地区, 使华中敌后抗战得以坚持和发展, 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 一方面, 共产党在华中许多重要城市及某些乡村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 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参加抗日斗争; 新四军已进入江南敌后地区, 中共领导的游击武装也已开始活动。另一方面, 由于以王明为书记的中共长江局执行右倾方针, 还“没有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后城市的附近组织起党所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 没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 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工作”; 新四军的发展还很小, 在给养方面很困难, 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很危险。按照刘少奇后来的说法: “华中党的行动路线, 与当时中央在抗战初期的行动路线是不同的, 或者是

相反的。”因而造成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在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

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发展华中的任务更加紧迫。这时，日本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加强了诱降活动。国民党内出现了投降逆流。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公开叛国投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虽然继续抗日，但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各地不断挑起反共摩擦事件。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危险。

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切断八路军、新四军的联系而分割消灭的阴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华中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将其视作八路军、新四军的生命线。在毛泽东和王稼祥联名发出的一份电报中说：“第一，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电报还提出：“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困难了。”这就是说，共产党的军队应该取得华中这个战略枢纽地带，使华北、华中、江南联成一片，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938年11月，刘少奇率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一行由延安前往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建了中共中原局机关。中原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区党的工作，发动中原地区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刘少奇安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页。

《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83页。

排了中原局的工作之后,于3月奉中共中央指示返回延安出席政治局会议。

当时,华中地区由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新四军还徘徊于国统区和敌伪边缘区,依赖国民党,而未积极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也没有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据地,有人甚至反对建立根据地。1939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东南局、中原局并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发出指示,强调指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但是,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给延安复电中认为:“目前不宜提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们更防范和限制。”当时,长江以北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虽然站稳脚跟,有所发展,但未在皖东建设根据地,也没有打开抗战的局面。据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回忆:“我们在江北反摩擦,搞些税收,他们还有意见,说这样搞政治影响不好。他们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第五支队政治委员郭述申回忆:当时“我们部队的活动、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枪支弹药补充没有来源,伤员的治疗条件很差,甚至解决部队的粮食、服装都很困难,抗日的局面还没有打开,形势对我们很不利”。

正如刘少奇后来指出的,他到华中时,国内和华中的形势都很困难。当时,“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实际地位减弱,同华北和八路军的联系被隔断,陷于敌伪顽夹击的危境”。刘少奇就是在这种“危境”时刻来到了华中。

《刘少奇在皖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刘少奇在皖东》,第17页。

《刘少奇在皖东》,第95页。

《刘少奇在皖东》,第105页。

《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

二

刘少奇在华中三年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10月,他选择皖东作为华中的战略基地,直接领导皖东军民的抗日斗争,建立了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指导整个华中地区工作。

1939年9月15日,刘少奇率徐海东等40余名干部离开延安,再赴华中。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各种手段,封锁、控制延安派往新四军的人员。刘少奇化名胡服,以徐海东“秘书”的身份,秘密前往华中。徐海东“以八路军高级军官身份,应付沿途国民党军队的盘问,行程比较顺利”。

11月6日,刘少奇一行到达豫皖苏边区涡阳北部的新兴集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地。在新兴集,刘少奇听取了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等的汇报。刘少奇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坚决东进的战略意图和方针政策。他在游击支队干部会议上,一再号召,东进,东进,再东进,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并对游击支队和豫皖苏根据地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

12月初,刘少奇一行渡过淮河,抵达皖东定远县藕塘区山黄家村。受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等欢迎。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刘少奇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领导新四军迅速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刘少奇认为,“游击战争是这些地区当时工作的唯一方向”,因此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领导华中敌后游击战争方面。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他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形

《缅怀刘少奇》,第129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71页。

势。首先,他指出王明的错误主要在于:只注重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只求得统一战线的发展,不注重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不注意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其次,他要求在党内军内广泛宣传中共中央的全面抗战路线,说明华中的党和军队面临的危险,使全体干部认识到对于反共顽固派的退让政策不是出路。会议明确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坚决反摩擦的斗争策略及大力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刘少奇在讲话中,批判了在大别山替别人建立根据地的“苦力政策”。他引用了《孔子家语·贤君》中“徙宅忘妻”的故事:一个人健忘,搬家时把自己的妻子忘掉了。他说:“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比这还要严重,不仅把妻子,而且连自己都忘掉了。为什么自己不去建立根据地,而要帮助国民党建立根据地呢?”他强调指出,中共中央的政策是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新四军,游击队要从大别山发展到东海边。刘少奇的讲话和中原局的决定,振奋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精神。“以前受王明路线的影响,那种‘寄人篱下’受挫折而造成的抑郁心情为之一扫。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总结经验教训,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工作也有了办法。在正确路线指导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扭转了对我不利的形势”。

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刘少奇领导皖东军民反“扫荡”、反摩擦,保卫和巩固了皖东抗日阵地。

1940年4月,刘少奇来到津浦路东半塔集,与第五支队司令部一起活动。他北渡淮河,抵达泗县罗岗村,检查与指导皖东北地区的工作,听取了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长兼政委张爱萍等的汇报,并“对建党、建军、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进行具体指示”。

6月,刘少奇由皖东北返回原驻地半塔集附近大田郢,即致力于皖东根据地的建设,并指导整个华中地区工作。此时,黄克诚率

《刘少奇在皖东》,第112页。

《刘少奇在皖东》,第107页。

《缅怀刘少奇》,第127页。

领的南下八路军 1.2 万余人到达皖北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会师。8 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往盱眙县到达大田郢,与刘少奇会见,商谈了向东发展开辟淮海抗日根据地问题。与此同时,陈毅、粟裕率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开辟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在皖东将近一年时间里,“正确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解决了存在的各种疑难问题,犹如适时而来的春风喜雨,迅速打开了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

第二阶段:从 1940 年 10 月至 1942 年 12 月,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前后领导新四军建设和发展,“贯彻党中央关于解决苏北问题,独立自主地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940 年 10 月初,黄桥决战歼灭顽军 1.1 万余人。10 日,陈毅率北上的新四军与黄克诚南下增援的八路军胜利会师于盐城以南白驹镇北的桥头,实现了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从此,华中、华北根据地沟通,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改变了过去华中新四军被日、顽分割包围的危险局面,使整个华中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变化。

10 月 21 日,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江北军政干校学员及护送部队千人(番号叫“乌江大队”),从皖东半塔集出发,向苏北挺进。31 日,到达苏北阜宁东沟镇黄克诚部队驻地,与黄克诚会见。11 月 5 日,刘少奇、黄克诚到达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陈毅会晤,共商华中抗日大计。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11 月 17 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叶挺来到苏北前,由陈毅代总指挥。

正当华中敌后抗战局面逐步打开之时,1941 年 1 月,国民党顽固派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 月 9 日,刘少奇在

《刘少奇在皖东》,第 112 页。

《缅怀刘少奇》,第 105 页。

盐城收到叶挺电报，惊悉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被国民党重兵包围，面临全歼的危险。他与陈毅等紧急商定对皖南军部的救援之策。1月12日，他和陈毅向毛泽东等建议，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在政治、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并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答复皖南事变的指示。14日，国民党顽固派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得逞。同日，毛泽东等向党内发出指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但是，1月15日，刘少奇向毛泽东发出长电，提出了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的新建议。他说：“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这里的同志于义愤之余，亦有立即举行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我们却有下列建议意见，望中央细心考虑。”他说：在抗日的前提下，“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即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接着，他分析了新四军的实力与处境，“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以华中来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因此，他向中共中央建议，应主要是在全国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为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他还就如何实行政治大反攻，在口号上、宣传上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刘少奇的新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听取各方意见后，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1月25日，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定方针，正式确定了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

《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皖南事变》，第146页。

《皖南事变》，第149页。

上取守势’的方针。实践证明,执行这个方针不仅彻底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维持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直至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1月18日,刘少奇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毅代理军长。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建立。按中央军委指示,将活动于陇海线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

皖南事变后,日军兴奋异常,加紧向华中各根据地“扫荡”,并叫嚣要“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日军将原驻防镇江地区的第十二旅团调到苏中沿江和运河沿线,侵占黄桥等重要市镇,同时加紧诱降活动。2月17日,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投敌。刘少奇指出:“此贼不除,后患甚多,望集全力迅速解决之。”为此,苏北指挥部举行讨逆战役誓师动员大会,陈毅对营以上干部作了战斗动员,讨逆总指挥粟裕命令部队歼灭李逆。20日晨,新四军突入李逆总部,共歼李伪军5000余人。

5月15日,华中局召开高干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的有关决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新四军问题的报告》。会议总结了皖南建军的经验教训,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使华中全党全军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5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刘少奇为书记,负责指导整个华中的敌后斗争。很快在华中敌后形成了以苏北为中心,包括苏南、苏中、淮北、淮南、皖中、鄂豫和浙东等根据地在内的强大抗战局面。

《皖南事变》,第193页。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

《陈毅传》,第265页。

1941年7月开始,日军对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刘少奇与陈毅直接指挥阜宁党政军民为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而战斗,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1942年1月20日,刘少奇在苏北阜宁县单家港主持召开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历时一个半月。3月4日,他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完全同意总结报告。刘少奇最后宣布:“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代。”

3月19日,刘少奇一行在干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离开了他战斗了三年的华中。在回延安途中,根据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精神,刘少奇于7月20日,给华中局、新四军负责人陈毅等写了一封1.8万字的长信,信中提出:“要把我们现在的工作,今后两年的工作,与将来的反攻斗争,战后新中国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他还对对日反攻与战后斗争等问题提出对策,希望华中地区党要“修明政治,生聚教训,整军经武,严修武备(各种武器器材弹药的聚集),为了坚持两年斗争须要这样,特别为了准备反攻及战后的斗争更须要这样”。这些意见,对华中局的工作及敌后斗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途中,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山东根据地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到12月30日,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穿越日军103道封锁线,刘少奇抵达延安。1943年1月1日,延安举行干部晚会,进行团拜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讲话”。

《陈毅传》,第284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31页。

《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1页。

三

刘少奇在华中以主要精力领导敌后游击战争,同时重视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为华中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突出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坚决贯彻新四军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方针。

如何发展华中,这是刘少奇从延安到华中途中一直思考的重大问题。他在到达彭雪枫部驻地后,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于1939年11月11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首次提出在一两个月后,派部分主力部队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的建议。11月19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并且具体指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

针对党内军内对新四军向苏北发展存在不同认识,刘少奇到达皖东后,在经过调查研究和慎重考虑后,于12月19日再次向中共中央和项英发出长电提出:“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苏北“我们没有正规部队及党的机关去活动,亦无地方党,而这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如中央及项同志同意,请速电复”。

12月22日,项英电复刘少奇并中共中央,认为对新四军的工作“不能作‘左’的布置”。次日,项英再电中央,强调皖南特殊,提出“在将来任何情况下,是以独立开展南方局面,以与北方配合,这是政治上策略上均应如此”。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刘少奇、项英发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编,《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刘少奇在皖东》,第19页。

《刘少奇在皖东》,第22页。

出指示,明确表示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并要项英从皖南、苏南抽调部队和干部发展江北。1940年1月14日,项英致电中央,对12月27日指示提出异议。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重申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并以彭雪枫部由3连人发展到12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9000人的事实说明,“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在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部署下,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苏南新四军渡江北上进入苏北黄桥地区。与此同时,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越陇海路南下,东进苏北。10月10日,北上新四军与南下八路军在盐城以南白驹胜利会师,实现了中共中央决定的开辟苏北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实践证明,刘少奇提出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刘少奇到皖东后,首先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错误,反对在反共顽固派进攻面前畏怯、退却、投降”;批判了“一切通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强调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即对国民党抗日的一面要主动团结,对其反共的一面要坚决斗争。1939年12月21日,日伪军2000余人向皖东地区发起“扫荡”,安徽省第五行政区专员兼第十游击纵队司令李本一仓皇逃走。刘少奇指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组织反“扫荡”战斗。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率部与日伪军激战于周家岗、玉屏山等地,击毙日伪军160多人,并于23日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在路西首次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为团结友军抗战,第四支队主动将收复的古河镇交还给李本一。

1940年3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华中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

《皖南事变》,第52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85页。

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部围攻路西定远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江北指挥部；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也调集重兵向路东第五支队进攻，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摩擦战斗迫在眉睫。敢不敢反摩擦，成了扭转时局的关键。刘少奇及时地提出“坚决反摩擦”的口号，并指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首先集中第四、第五支队击退桂军，并一举解放定远县城。路西激战正酣时，韩德勤部一万余人进犯路东半塔地区。路东留守部队固守待援，奋战7昼夜。最后，第五支队在路西主力和叶飞、陶勇部队驰援下，击退了韩军。

定远、半塔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使津浦路东、路西连成一片，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第三，理直气壮地抓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建设。

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刘少奇到皖东之前，华中地区没有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他到皖东后很快提出：“皖东地区的根本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观念不明确，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解决这个问题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环节。”他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建立游击队”的口号。在他的号召下，部队和中共地方党组织立即拟定了扩军计划，“一批批党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仅仅3个月时间，第四、第五支队就由原来的7000余人发展到1.5万余人。”

定远、半塔自卫反击战胜利后，刘少奇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及时地提出了“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口号。他把“根据地和人民政权比作是‘家’。”他说：“打日本军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人民政权。有了根据地和政权，我们就

《刘少奇在皖东》，第114页。

《刘少奇在皖东》，第114页。

可以招兵、征粮、收税，就有人、有粮、有钱，开展游击战争就有了可靠的依托。”有人问：我们建立政权，派区长、县长，国民党不批准怎么办？这样会不会破坏统一战线？刘少奇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干事要国民党批准干什么？有利抗战，人民批准就可以干。”

在刘少奇的直接指导下，1940年3月17日，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委派魏文伯任县长。刘少奇亲自和魏文伯谈话，教他如何当好县长。接着，先后建立了滁县、凤阳、全椒、合肥和（县）含（山）巢（县）、来安、嘉山、盱眙、天长、高邮、六合、仪征、淮（安）宝（应）等15个县抗日民主政权，还先后成立了津浦路东、路西各县抗敌联防委员会办事处，并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县、区、乡政府，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此，华中敌后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即皖东抗日根据地在津浦铁路两侧正式形成。

1940年2月7日，刘少奇以中原局名义发出指示，提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在苏北及皖东北目前的任务，是争取该地区成立党所领导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据地。”3月24日，皖东北成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泗县县政府，陈国栋任县长。6月，刘少奇到皖东北检查指导工作，在朱湖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干部作了《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他指出：我们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忽视自己独立力量的发展，不要丧失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独立性。他说：“发展力量就是抓武装，抓政权，抓发动群众，抓财政经济，抓发展党，抓培养干部，这是我们的‘六大宝’。‘六大宝’的总体，就是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还高瞻远瞩地指出：“在敌后建立根据地，不仅是变敌后为前线，准备反攻的前进阵地与力量，支持与鼓舞全民族，还有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准备民主共和国基础的意义。”

《刘少奇在皖东》，第113页。

《刘少奇在皖东》，第29页。

《缅怀刘少奇》，第141页。

《缅怀刘少奇》，第140页。

第四,重视抗日根据地中共党组织的建设和干部教育。

刘少奇在华中,还用很大的精力抓共产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建设和干部教育。他到皖东后,看到当地新党员多,就叫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编写党课教材,向党员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和阶级教育。

根据地建立起来后,许多中共党员在各级政府和群众组织里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环境变了,地位变了,如何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一个新的重要问题。1940年7月1日,刘少奇在大田郢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19周年干部大会上,作了《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系统论述了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分析了当时共产党内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这个报告在中原局机关《抗敌报》上发表,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广为传播,影响十分深远。张爱萍回忆说:读到这个报告时,“我们都觉得他的每一句话,似乎也都是对着淮北地区和我们自己的情形讲的。这个报告对当时敌后和全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正因为这样,它成为以后整风中的重要文件之一。”

刘少奇还在苏北主持筹办了华中局党校,并兼任校长,亲自为学员授课。他写了大量的论著,仅在1939年7月至1941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写了近40万字的党建理论著作,其中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这些著作,对提高华中乃至全国共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荣维木)